政治科學論叢／第 84 期／民國 109 年 6 月／頁 1-38

政治知識的面向與政治參與的類型*

黃秀端**、吳俊德***、張一彬****、林瓊珠*****

摘　要

政治知識是影響政治參與的重要因素，當民眾擁有越高的政治知識，就越有可能參與政治活動。然而，政治知識有不同的面向，政治參與也有不同的類型，同一個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不同類型的政治參與的影響都一樣嗎？不同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同一種類型的政治參與是否會產生不同的影響？這個謎團少有學者回答，也是本文想要探討的問題。

本文將政治知識區分爲三個面向：人物、制度及政策與議題；再將政治參與區分爲投票、競選相關活動以及非常態性參與（陳情請願、靜坐抗議、示威遊行等）等三種類型。本文根據過去文獻以及理論推演建立三個研究假說（hypotheses）：第一，在投票參與中，人物面向的政治知識有較高的影響力。第二，在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中，制度面向的政治知識有較高的影響力。第三，在非常態性政治參與中，政策與議題面向的政治知識有較高的影響力。

本文作者在 2016 年總統大選後進行電訪問卷調查，資料分析結果顯示：第一，三個面向對於投票參與皆無影響力。第二，人物面向、制度面向以及政策與議題面向都會影響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其中以

* DOI:10.6166/TJPS.202006_(84).0001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教授，E-mail: sowd@scu.edu.tw。
*** 東海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E-mail: jw0107@gmail.com。
**** 淡江大學公共行政學系助理教授，E-mail: cyb@mail.tku.edu.tw。
*****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E-mail: clinf@scu.edu.tw。
收稿日期：107 年 4 月 8 日；通過日期：109 年 6 月 22 日

臺灣人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制度面向的影響力最大。第三，制度面向以及政策與議題面向都會影響非常態性政治參與，但以制度面向的影響力較大。總結而言，不同面向的政治知識在不同類型的政治參與中，確實會產生效果各異的影響。

關鍵詞：政治知識、政治參與、政治知識面向、非常態性政治參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言

民主政治的運作仰賴民眾對於公眾事務的參與，不論是以投票的方式在選舉中決定領導人；或是參加造勢晚會、拉票、捐錢來展現對於特定政黨或是候選人的支持；甚至是向政府機關進行陳情請願或是集會遊行的抗議活動來尋求政策的改變。若是沒有政治參與，人民的意志無從展現，政府也不必對民意有所回應，或是對政策的成敗負責。因此，民眾對於政治活動的參與乃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基礎，也往往被視爲是民主的定義之一（Dahl, 1973）。

參與政治活動需要資訊與知識，首先，如果民眾不知道有什麼政治活動正在進行，自然不會去參加；就算知道有什麼政治活動將會舉行，例如知道選舉之前會有造勢晚會，如果不清楚時間、地點，即便有意願也無從參加。誠然，擁有資訊未必會去參與政治活動，因爲影響個人政治參與的因素還有動機（motivation）、能力（ability）以及動員（mobilization）（Brady et al., 1995）。但若是沒有資訊，參與的可能性會非常小，擁有資訊可以說是政治參與的必要條件（necessary condition）。

其次，當個人擁有越多的資訊與知識，就越有可能去參與政治活動。一方面，具有資訊的選民（informed voters）才有能力區辨出不同政黨與候選人在各個議題上的立場，進而選擇與自己立場相近的候選人（Downs, 1957）。Palfrey 和 Poole (1987) 也指出，當民眾知道不同候選人彼此之間的差異，就比較不會因爲「反正投給誰都沒差」這樣的想法而不去投票。另一方面，當民眾越瞭解某項政治活動的目的，或是某個特定政策對其產生的影響，就越有可能會去參與各種不同的政治活動，以表達意見、爭取權益。因此，政治知識是驅使民眾進行政治參與的一個重要因素。

政治知識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已經在許多的研究中被證實，然而，在這個被普遍接受的常識（conventional wisdom）背後，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之間可能存在著更細緻也更複雜的關係，值得學者繼續深入探究。政治知識有不同的面向，政治參與也有不同的類型，在兩者的對應上，我們發現幾個有趣的問題。首先，同一個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不同類型的政治參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與的影響都一樣嗎？還是會不一樣？其次，不同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同一種類型的政治參與的影響都相同嗎？還是效果各異？如果效果是不一樣的，那麼在討論政治知識對於政治參與的影響時，除了知識高低以外，還要去注意民眾所具有的是哪一個面向的知識。這些謎團具有理論的重要性，卻少有學者回答，因而成爲本文想要探究的問題。

本研究將政治知識區分爲人物面向、制度面向以及政策與議題面向。根據過去的文獻和理論，我們推論這些面向對於不同類型的政治參與會產生高低不同的影響，並建立三個研究假說（hypotheses）：第一，在投票參與中，人物面向的政治知識有較高的影響力。第二，在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中，制度面向的政治知識有較高的影響力。第三，在非常態性政治參與中，政策與議題面向的政治知識有較高的影響力。本文作者在 2016 年總統大選後進行電訪問卷調查，實證分析結果顯示：不同面向的政治知識確實會對於不同類型的政治參與產生效果大小不一的影響。首先，在投票參與方面，三個面向的政治知識皆無影響力。其次，人物面向、制度面向以及政策與議題面向都會影響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其中以制度面向的影響力最大。最後，制度面向以及政策與議題面向都會影響非常態性政治參與，但以制度面向的影響力較大。

本文的章節安排如下：第二節回顧國內外關於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關係的文獻。第三節討論政治知識的面向與政治參與的類型、陳述本文的論點以及理論依據，並且建立研究假說。第四節是研究設計，說明資料來源、各個變數的操作化以及分析方法。第五節報告實證分析的結果，最後一節檢討研究發現並做總結。

貳、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

根據 Delli Carpini 和 Keeter (1996: 10) 的定義，政治知識是「一系列儲存在長期記憶中關於政治的事實資訊」。Mondak (2001) 認爲，政治知識是研究政治行爲的基礎構念，會對行爲產生各種影響，從投票行爲、投票選擇到個人的容忍度以及對組織的信念。政治知識是協助民眾將政治態度轉換爲行動的工具，如果民眾對於參選的候選人的知識程度相當低，將無法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區辨不同候選人和政黨間的差異（Popkin & Dimock, 1999: 122），便難以做出合理的選擇。

許多研究結果皆指出政治知識較高者比起政治知識較低者，更有可能會去投票及參與政治（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6；Galston, 2001；Grönlund & Milner, 2006；Howe, 2006；Lassen, 2005；Martinez & Gill, 2006；Pattie & Johnston, 2003；Wu & Liu, 2017）。Palfrey 和 Poole (1987) 用 ICPSR 資料分析 1980 美國總統選舉，發現政治知識與政治激進主義和投票都有顯著的關係。Delli Carpini 和 Keeter (1996) 分析 1988 NES 問卷資料，發現政治知識是投票很好的解釋變數。另外也有學者發現，對於眾議院越了解的選民，越會在眾議員選舉中投票（Wattenberg et al., 2000）。Lassen (2005) 則是分析丹麥哥本哈根對於分權化的公投，在十五個地區中有四個地區曾經針對公投做過實驗性研究，因此這些地區的居民比其他地區的居民有較多有關分權化的資訊。而他的研究發現，即便是控制了教育程度和其他相關因素，資訊對於投票仍有顯著與重要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知識並非外生變數（exogenous variable），去參與政治活動本身會增進政治知識、影響參與的其他動機也可能讓個人獲得更多的政治資訊，因而在討論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關係時，會有內生性（endogeneity）的問題。爲解決此問題，Larcinese (2007) 採取工具變數（instrument variable）途徑來估計資訊對投票率的影響，他使用英國 1997 年大選的 BES 問卷，這份資料包括一些有關英國政治與制度系統的問題，這些問題反映長期政治的資訊，而不是競選時期獲得之資訊。Larcinese 以大眾傳播媒體的資訊供給做爲工具變數，在控制所有的人口統計變數、政治態度變數之後，發現政治知識是投票很好的預測變數。

就長期趨勢而言，有經驗研究顯示在某些民主國家政治參與的持續下降，與該國民眾不斷降低的政治知識有關連（Bennett, 1988），若是此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將可能對民主過程的正當性產生不良影響。Howe (2006) 比較加拿大與荷蘭兩國，發現兩國年輕人的政治知識水準都在下降，雖然此種現象對荷蘭的年輕人沒有影響，卻對加拿大年輕人的投票率有影響。Gidengil 等（2004）的研究指出，年輕人在加拿大對政治越來越不關心，其中最明顯的是政治知識的低落，造成年輕人與年長者對於加拿大政治事實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的了解差距越來越大。他們更進一步發現政治知識對於年輕人政治參與的影響甚於年長者，長期觀察顯示，政治知識的低落對政治參與的影響並不是生命周期（life cycle）現象，而與世代差異理論較爲符合。Milner (2007) 認爲加拿大與美國的政治參與皆低於歐洲，歐洲的強化高公民素養教育比美國的強調對自願組織的參與要有效。

雖然有許多的研究指出政治知識會影響政治參與，卻有一些學者認爲資訊與行爲是無關的，包括 Popkin (1991)、Wittman (1995)、Lupia 和 McCubbins (1998)。利用空間模型理論，學者指出有些不具有充分資訊的人，會學習他們所信任的具有充分資訊的人（Calvert, 1985；Lupia, 1992；McKelvey & Ordeshook, 1984），假如政黨政綱持續地與某些特定的社會經濟團體的利益相連，那麼政黨認同或公共的支持（endowment）可以提供簡單而有效的工具性投票方式。

Lupia (2016) 則是從操作性的角度去思考，他認爲現有政治知識的測量方式跟考試一樣，由學者列出難度不一的「事實題目」，例如副總統是誰、大法官有幾個、立法委員任期幾年、去年經濟成長率是多少。他質疑這樣的測量究竟要達成何種目標，答對大法官有幾人，是否能幫助民眾選出對的候選人？也就是說，Lupia (2016) 認爲民眾用以參與政治、面對政治挑戰會用到的政治知識，並不能有效的被這些問題測量出來，同時他也認爲民眾並不需要具有全面的政治知識。

在國內文獻方面，林瓊珠（2005）對臺灣民眾的研究顯示政治知識低的民眾比政治知識高的民眾較少參加選舉參與活動，所謂的選舉參與活動除了投票之外還包括替候選人拉票、捐款、發宣傳單、掛旗幟、參加造勢活動等。Wu & Liu (2017) 雖然發現政治知識的程度高低與投票率有關，政治知識程度越高者越會去投票。不過該研究僅以簡單的圖示顯示此種關係，並未控制其它變數。Huang 等（2013）與蕭怡靖（2009）的文章都是以選民對立法委員新選制的認知爲自變數，探討臺灣民眾在立委選舉的參與情形，並且發現選民對選制的認知的確有顯著影響。換言之，對新選舉制度的知識越高者，越會去參與投票。不過，Huang 等（2013）卻發現在 2012 年立委選舉的小黨支持者中，對選舉制度有較高知識者越傾向不去投票，因爲小黨支持者知道，在新選制之下其所支持的政黨及候選人當選機率相對較低。蕭怡靖（2009）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的研究則指出選民對於新選制的評價對他們的選舉參與沒有顯著影響。不過，上述兩篇研究都僅把焦點放在臺灣選民在立委選舉的投票參與情形。

參、政治知識的面向與政治參與的類型

從上述的文獻檢閱可以看出，具有較高政治知識的民眾越有可能去參與政治的這個研究假說，大致是得到經驗證據支持的，也就是說，學界普遍同意政治知識對政治參與有著正面影響。本文以爲，兩者之間可能有更複雜的關係，因爲政治知識有不同面向，政治參與也有不同類型，不同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不同類型的政治參與影響爲何？還可以再深入探究。

首先，政治知識有不同的面向。Delli Carpini 和 Keeter (1991) 將政治知識分爲兩個部分：一是爲教授事實（taught facts），也就是從學校所學到的知識；另一是觀察事實（surveillance facts），乃是會隨著時間而變化的資訊，民眾必須關注時事才會知道。他們認爲政治知識應該包括政府制度與程序（government institutions and procedures）、當前議題（contemporary issues）、公民權利與自由（civil rights and liberties）、以及政府現行政策（current government policies）。這兩位作者在後續的著作（Delli Carpini & Keeter, 1993）再將政治知識分爲公民（civics，實際上就是政府制度與程序）、政黨以及人物三種指數，在進行數次測試之後，推薦了五個最有效度的題目，包括兩題政黨（眾議院多數黨、政黨意識型態）、兩題公民（違憲審查機關、推翻總統覆議權比例）以及一題人物（美國副總統）。

Jennings (1996) 則認爲除了教授事實與觀察事實之外，政治知識應該還有一個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的部分，其重要性在於幫助同時代的人建立共同記憶，因而產生不同世代在知識上的差異。Barabas 等（2014）將政治知識區分爲時間（temporal）以及主題（topical）兩個面向：在時間面向上，依事實發生的時間遠近分爲靜態（static，超過 100 天）或觀察（surveillance，不到 100 天）；在主題面向上，將事實分爲一般（包括人物與制度）或政策。根據這樣兩個面向，政治知識可以歸爲四種類型，並進一步探討過去我們對政治知識的理解在新的區分方法之下是否依然成立，他們發現，教育與媒體使用對於政治知識的影響會依不同面向而異。Ferrin

臺灣大學 政治學系

等（2018）將政治知識分成幾個類別，傳統的政黨與政治人物、經濟議題、制度和民主議題以及特殊政策，發現性別差距會因不同的政治知識類別而有差異。雖然不同學者提出不同的分類方法，以上這些研究都指出：政治知識不是單一面向的構念，而是由不同面向所組成。在過去討論政治知識與政治參與的研究中，對於政治知識的處理方式大多是計算受訪者在數個題目中能夠提供正確答案的數目加總，也就是只注意受訪者政治知識的多寡，忽略了其所具有的知識可能屬於不同面向。

其次，在政治參與方面，Verba 和 Nie (1972) 對於政治參與的定義爲：「一般民眾爲了影響政府的人與事所採取的合法行動」，他們強調的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參與以及體制內合法的參與。Huntington 和 Nelson (1976) 認爲只強調合法的參與未免過於狹隘，因此他們採取較爲寬廣的定義，認爲「只要是企圖去影響政府決定的行動」就是政治參與。對他們而言，參與可以是個人的、集體的、合法的、不合法的、有效的、無效的、自主的或被動的。

Barnes 等（1979）進一步將政治參與分爲常態性（conventional）的政治參與以及非常態性（unconventional）的政治參與。前者是在民主國家裡民眾經常會進行的政治活動，包括投票、聯絡民意代表、捐贈政治獻金、參與造勢晚會、協助動員拉票等；後者則是一般民眾較少會去從事的，例如連署請願、遊行示威、抵制杯葛、罷工、甚至佔領建築物等。常態性政治參與是人民在體制內涉入公共事務的管道，也是民主政治運作的基礎；非常態性政治參與主要是對政府表達不滿，有些行爲甚至是體制外或是不合法的。在民主國家，雖然以和平的方式進行抗議屬於公民權利（civil rights），非常態性政治參與較不普遍。

從上述討論可知，政治參與包括許多不同的行爲，常態性與非常態性的區分只是一種分類的方式。對本文的研究問題來說，比較有意義的論點在於，影響不同政治參與行爲的因素並不一樣（Brady et al., 1995；DiGrazia, 2014）。以投票、捐贈政治獻金以及抗議來說，這三種行爲的動機以及所需要的資源都不大一樣：在動機上，投票往往被視爲是一種公民義務（civic duty），另外兩種行爲則不是，因此這兩種行爲可能需要更強的動機。在資源上，捐贈政治獻金需要金錢，抗議與遊行示威需要花時間，且可能面臨違法的風險（Brady et al., 1995；DiGrazia, 2014）而這兩種資源在投票上都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不大需要。[1]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即便都屬於常態性政治參與，同一種資源對於投票與捐贈政治獻金的影響力就不一樣，既然相同因素對不同政治參與行爲的影響力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很合理地懷疑，同一個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不同類型政治參與的影響力可能也會不一樣。同樣的邏輯，不同面向的政治知識在同一種類型的政治參與中，效果可能也不一樣。

那麼，是哪個面向的政治知識在何種類型的政治參與有比較大的影響力呢？這個問題鮮有學者注意，相關的討論也很少。Johann (2012) 將政治知識分爲政治行爲者（political actors）以及遊戲規則（rules of the game）兩個部分，前者是關於政黨、候選人以及官員的資訊；後者則是政治體系如何組織、運作的資訊。他的論點一如 Palfrey 和 Poole (1987)、Popkin 和 Dimock (1999)，認爲行爲者的資訊是選民在投票時所需要的，如果民眾不具有關於行爲者的知識，他們就無法分辨候選人的不同，也難以做出有意義的選擇。反之，當民眾具有行爲者的知識，他們會比較願意去投票，因爲投下的那一票會帶來較高的效用。另一方面，如果民眾不瞭解政治體系如何運作，或是不瞭解除了選舉之外有哪些參與政治的管道，他們涉入公共事務的機會自然就會降低。因此，關於遊戲規則的知識對於非投票的政治參與有較大的影響力。

Johann (2012) 由此提出兩個研究假說：第一，當民眾關於政治行爲者的知識越高，就越可能成爲投票者。第二，當民眾關於遊戲規則的知識越高，就越可能成爲投票以外其他政治活動的參與者。這兩個研究假說在他的實證研究中得到證據支持，關於遊戲規則的知識更是對於民眾成爲抗議者、以及成爲積極參與所有活動者（complete activists）有強大的預測能力。Johann (2012) 的研究開啓了政治知識不同面向與政治參與不同類型之間的連結，但是，本文認爲他的論點不夠完整，還有可以再精進之處，以下分述之。

以第一個研究假說而言，本文大致上是贊同的，但其中仍有一些問題。首先，他認爲關於政治行爲者的知識只會影響投票參與，而不會影響其他類型的政治參與；其次，他認爲關於遊戲規則的政治知識對投票參與沒有

[1] 投票是否需要時間資源，每個國家情況不一。在臺灣，由於投票所眾多而且程序簡便，相對來說投票要耗費的時間資源較少。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影響。換言之，在 Johann (2012) 的論點中，政治知識的面向與政治參與的類型是一對一的關係。[2] 本文則以爲，兩者的關係未必是一對一，這是因爲一項政治資訊的內容往往不會侷限於單一面向，也會包括其他面向的資訊，例如一則關於候選人的新聞可能就包含人物面向以及制度面向的資訊，不同面向的資訊也因此會產生連結。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民眾獲取人物面向的知識，他同時也獲取並連結了其他面向的知識。由於資訊的連結，當民眾從記憶中擷取（retrieve）人物面向的知識時，他同時也會擷取到與其相連的其他面向的知識。因此，當人物面向的知識要影響投票參與時，與其相連的其他面向知識也可能去影響其他類型的政治參與。同理，其他面向的知識也可能會連結到人物面向，因而去影響投票。[3]

既然不同面向的政治知識都可能會影響投票參與，會是哪個面向的影響力比較大呢？我們認爲：由於人物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投票最爲重要，在投票參與中，人物面向知識的影響力應該會大於其他面向知識的影響力。這是本文對 Johann (2012) 的第一個研究假說所做的修正。

對於 Johann (2012) 的第二個研究假說，本文則有不同的想法。首先，Johann (2012) 將投票以外的其他政治參與，包括常態性與非常態性通通合併起來歸成一類，認爲這些活動都會受到關於遊戲規則知識的影響。本文則以爲，應該將投票以外的常態性、非常態性政治參與區分出來，因爲兩者在本質上有所不同，同一個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兩者的影響力就可能不同。其次，Johann (2012) 在遊戲規則的知識對於政治參與會造成什麼影響這個部分，他的解釋是很籠統含糊的，本文對於這個論點並不滿意，因此試著加以修正，並做更清楚的說明。

本文以爲：遊戲規則是政治體系如何組織、運作的資訊，在民主國家中，其中的核心部分是政黨在選舉中相互競爭的過程與結果（例如選舉制度爲何，最大在野黨是誰等等）。Reichert (2016) 曾經提到：常態性政治參與多與政黨以及競選活動有關，因此本文以爲，當民眾具有較多關於遊戲

2　Johann (2012: 57) 在文中提到：特定的知識連結到特定的參與方式。

3　Johann (2012) 的實證分析事實上已經證明了這一點，他發現關於遊戲規則的知識對於成爲積極參加所有活動者有很強的解釋力，而所有活動包括投票在內，也就是說關於遊戲規則的知識不只會影響投票以外的活動，也會影響投票。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資料庫

規則或政治制度方面的知識，會比較瞭解選舉結果可能造成什麼影響，因此會有比較清楚的支持對象、對競選過程關心程度較高、也比較可能會去觀看政見發表會、參加造勢晚會，甚至捐贈政治獻金、協助動員拉票以幫助支持對象獲得勝選。也就是說，制度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競選相關活動會有較大的影響。

如同第一個研究假說，本文在這裡並不是說制度面向的知識只會影響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而不會影響其他類型的政治參與；也不是說其他面向的政治知識不會影響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這個論點想要強調：既然制度面向的知識和競選相關活動的關係最爲密切，因此對於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來說，制度面向應該是各個不同面向的政治知識當中影響力比較大的一個。

在非常態性政治參與方面，Lewis (2001) 曾經提及：「民眾之所以未能去挑戰政治體制或政策，經常是因爲他們沒有知識或是認知錯誤」。而何種政治知識會影響非常態性政治參與呢？Lee (2015) 指出，政治知識有一個面向是「反對性知識」（oppositional knowledge），其定義爲「對於支持或參與反對活動有用的事實與概念，這些知識會有助於形成對於當政者的批判態度」。[4] Lee (2015) 的反對性知識包括關於反對團體及人物的事實資訊、對於主要政治經濟勢力的負面想法、以及對於反對陣營在論述中所使用概念（例如公民不服從）的理解。

本文贊同反對性知識的概念，認爲當民眾具有越多反對性知識，就越有可能參與抗議活動。至於反對性知識的內容，本文對 Lee (2015) 的說法沒有異議，但認爲應該還有另外一個部分也很重要。Reichert (2016) 曾經提到，非常態性政治參與的目的是要在特定議題表明立場，或是反對特定政策，是以議題爲基礎的參與（issue-based participation）。因此我們的想法是：民眾之所以會去請願、抗議，一種可能是因爲被某項政策所傷害，或是同情那些被傷害的人，因而想要去捍衛自己或他人的權益（例如反年金改革的抗議行動）；另一種可能是在某項社會議題上採取某種立場，爲了傳達、

[4] 首先提出反對性知識這個概念的學者是學者 Coy 等，他們的定義是「清楚表達出來的社會文化批判，並結合替代性觀點」（2008）（轉引自 Lee, 2015），Lee (2015) 的定義則不強調替代性觀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提倡自身偏好而採取行動（例如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

如果這樣的想法不至於謬誤，當民眾對於政策以及社會議題有越多的瞭解，就越可能知道特定政策造成的影響、或是對某個議題有不同的意見，如此就越可能參與抗議活動。Bourne (2010) 也發現在牙買加，那些對政府政策不滿所累積的不信任是促使民眾從事非常態政治參與的因素。職是之故，我們認爲：反對性知識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份應該是關於政策以及社會議題的事實資訊，當民眾越瞭解當前的政策與議題，就越有可能去進行非常態性政治參與。同樣地，本文並不排除政策與議題面向的知識會影響其他類型政治參與的可能性；也不排除其他面向的知識會影響非常態性政治參與的可能性，此論點想要強調的是，既然政策與議題面向的知識和非常態性政治參與的連結最爲緊密，因此在各個不同面向的政治知識當中，政策與議題面向的影響力應該會是比較大的。

經由上面的討論，本文以爲：不同面向的政治知識在同一個類型的政治參與當中影響力並不相同。本文將政治知識分爲人物、制度、政策與議題三個面向，另將政治參與分爲投票、競選相關活動、非常態性參與三種類型，並建立三個研究假說如下：

假說一：在投票參與中，相較於其他面向，人物面向的政治知識有較高的影響力。

假說二：在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中，相較於其他面向，制度面向的政治知識有較高的影響力。

假說三：在非常態性政治參與中，相較於其他面向，政策與議題面向的政治知識有較高的影響力。

肆、研究方法

本文的資料來源爲本研究團隊進行的電話訪問調查，訪問時間爲 2016 年 4 月 15 日至 2016 年 4 月 19 日。[5] 抽樣方式採用中華電信最新出版之臺閩

[5] 本研究得到科技部研究計畫的支持，計畫名稱爲「政治知識的實驗與測量」，計畫編號爲 104-2410-H-031-026-MY3，特此表達感謝之意。

臺灣大學期刊資料庫

地區電話號碼簿所建置成的完整電腦資料庫，以其爲抽樣清冊，並採取兩階段的抽樣法。第一階段使用抽取率與單位大小成比例的方式（Probability Proportional to Size, PPS）與「系統抽樣法」（systematic sampling），自住宅電話簿資料庫抽取樣本局碼，以取得電話號碼局碼組合（prefix）。

由於電話號碼簿並未包含未登錄電話，因此抽出的電話必須進行「隨機撥號法」（Random Digit Dialing, RDD）的處理程序，才能做爲訪問使用。在第二階段時，在第一階段所抽的電話號碼最後兩碼，以隨機亂數方式取代之，俾使原本沒有登錄在電話號碼簿上的住宅電話，也有機會能夠中選，以解決樣本涵蓋率不足的問題。另外，本調查在實際接觸樣本的過程中，採用「戶中選樣」，使不同性別、不同年齡層的受訪者，在訪問過程中的受訪機率能趨近於相等，確實貫徹機率抽樣原則，本調查完成 603 份。

爲使樣本結構與母體相符，本調查以「多變數反覆加權（raking）」的方式進行成功樣本統計加權，亦即先調整樣本之性別結構與母體相符，然後依序調整年齡、教育程度及地區等變數結構，直至調查樣本在這些變數的分布與母體一致。

本文的依變數爲政治參與。由於在研究假說中，政治參與有三種類型，因此本文有三個依變數。這 3 個依變數皆以二元變數（binary variable）來處理，它們的值不是 1 就是 0。在投票參與方面，若受訪者在 2016 年總統大選有去投票，不論投給誰都登錄爲 1，[6] 沒有去投票則登錄爲 0。在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上，我們列出五項活動：觀看候選人政見發表會、要求親友投票（或不投票）給某位候選人或政黨、參加爲候選人所舉辦的集會或餐會等活動、擔任候選人或政黨的助選人員或義工、捐錢給候選人或政黨（包括購買餐券、紀念品等）。只要在 2016 年總統大選前有去參加前述五項活動當中的任何一項，即登錄爲 1，沒有參加任何一項則登錄爲 0。非常態政治參與包括：簽署請願書、遊行示威、靜坐抗議或罷工的經驗。同樣地，若是受訪者在過去三年內有參加前述四項行爲其中之一，即登錄爲 1，沒有參加任何一項則登錄爲 0。

本文的主要自變數爲政治知識，爲了檢驗研究假說，我們需要民眾對

6 投廢票也登錄爲 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政治人物、政治制度、政策與社會議題的資訊。因此，本文作者在設計問卷時，用來測量政治知識的題目便包含了這三個面向。過去有些問卷調查在測量政治知識時使用的題目過少，[7] 這會造成兩個問題：一方面，只用一、兩題來測量某個面向的政治知識可能失之偏頗，受測者若是一時忘記或剛好不知道答案就會被判定爲沒有知識。另一方面，如果施測的題目較爲簡單，大部分民眾都能答對，政治知識的變異量就會很小，如此不利於統計分析。爲了避免這些問題，本研究在各個面向上都以數個題目施測。

政治人物方面包括四道題目，問現任的美國總統、南韓總統、德國總理及我國的行政院長是誰。制度面向有五題：負責解釋憲法之機關、在立法委員的選舉中，每一個選民可以領幾張票、政黨至少需要得到百分之多少的政黨票，才能分配不分區立委席次、立法院一屆總共應選出之立委席次、立法院的第二大黨。在政策與議題方面，包括一般時期軍人犯罪的審判機構、[8] 目前政府處理核四的方式、太陽花運動抗議事件是針對兩岸之間的哪一個協議、我國的基本工資等四道題目。

在測量上，本研究採用開放式題型（不提供選項）讓受訪者自由回答。不採用封閉式題型（提供選項）的原因是，受訪者在封閉式題型可以猜答案，這會造成兩個問題：一方面，每個人的猜題傾向不同，這會降低測量的效度（validity）（Mondak, 2001）；[9] 另一方面，去猜答案的受訪者可能會猜對，如此會高估其政治知識，影響測量的準確性。在開放式題型中，受訪者難以去猜答案；就算去猜，猜對的機率也是微乎其微，如此可以避免這些問題。當然，開放式題型會有較高比例的受訪者回答不知道，其中也

7　黃秀端等（2014）指出：比較選舉制度研究（CSES）在過去僅要求每個國家用 3 個題目來測量政治知識，臺灣的調查研究「臺灣選舉與民主化調查」（TEDS）在 2012 年以前也只有三題。

8　表面上看起來，這個題目問的是政府機關職掌，應該歸類在制度。本文認爲，從軍事法院改爲普通法院的起因是社會重大爭議事件（2013 年的洪仲丘事件），爲了回應民眾抗議的壓力以及社會對於軍中人權的關注，政府才修法改變原有的政策，所以將其歸類在政策與議題面向。

9　當遇到不會的問題時，有些人傾向去猜答案，有些人則否，這種個人特質稱爲猜題傾向（propensity to guess）。在封閉題型中，除了知識以外，受訪者的猜題傾向也會影響測量的結果。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許有一部份的人是具有部分資訊，只是因爲不確定答案或其他原因而回答不知道，因而可能會低估其政治知識（Mondak & Davis, 2001）。[10]

在計算政治知識的分數時，我們依照過去常見的方式，一個完全正確的答案得 1 分、不知道得 0 分。然而，由於是開放式題型，受訪者的答案五花八門，對於這些各式各樣的答案，我們依據下面的標準來進行編碼。首先，某些答案不精確或是不完整，但是和標準答案很接近，例如一屆立法委員選出幾位，正確答案是 113，但受訪者回答「一百一十幾位」；[11] 又例如南韓總統回答「朴○惠」，[12] 可以判斷出受訪者雖然記憶略有模糊，但明顯是知道正確答案的，這樣的答案我們編碼爲「接近正確」，給予 0.5 分。

其次，有些受訪者無法答出準確的名稱，但是能以形容詞描述該題的正確答案，例如美國總統回答「黑人」，[13] 或是服貿協議回答「有關貨品交流的」，我們認爲這樣的答案顯示受訪者具有部分的知識，並不是全然無知，因此這一類的答案我們編碼爲「形容詞描述」，給予 0.5 分。另外，有少數的受訪者在回答時強調他知道答案，只是一時想不起來，這樣的情況我們選擇相信受訪者，也給予 0.5 分。最後，如果受訪者的所回答的與正確答案差距甚大，無法歸類爲前述的「接近正確」或是「形容詞描述」，即屬於錯誤的答案而給予 0 分。簡言之，受訪者的每一個回答我們都將其編碼爲「正確答案」、「接近正確」、「形容詞描述」或是「錯誤答案」，[14] 並依照

---

10 黃秀端等（2014）分析 TEDS2012 的調查資料發現：受訪者有較高的比例在開放式題型一題都沒有答對，另外，民眾在開放式題型無反應的比例也高於封閉式題型。

11 在立委數量的題目上，當受訪者回答的數字介於 103 到 120 之間，或是很接近的估計值如「一百零幾」或是「一百一十幾」，我們編碼爲「接近正確」，給予 0.5 分，其他答案皆算錯誤。在多少比例的政黨票可以分配不分區立委席次的問題上，正確答案爲 5%，其他答案皆算錯誤，只有一位受訪者例外，其答案爲「3% 或 5%」，我們給予 0.5 分。在立委選舉可以領幾張選票的問題上，正確答案爲 2 張，其他答案皆算錯誤。在基本工資的問題上，正確答案爲 120，當受訪者的答案介於 115 到 125 之間，或是「一百二十多」，我們編碼爲「接近正確」，給予 0.5 分，其他答案皆算錯誤。

12 當時的南韓總統爲朴槿惠，若受訪者回答「朴什麼惠」、「朴金惠」、或是類似這樣的答案。

13 當時的美國總統爲歐巴馬（Barack Obama），爲美國史上第一位非裔美國人總統。

14 在進行編碼之前，本文的共同作者們有召開會議對於在每一道題目當中，受訪者所回答的每一個答案進行討論，判定其應該屬於正確答案、接近正確、形容詞描述或錯誤答案，希望經過集體討論的方式來降低編碼的主觀性。如對編碼有疑問，受訪者的原

臺灣人文社會研究資料庫

上述標準給分。編碼後各題答案的分布情況列於表 1。

表 1　各題編碼後答案分佈狀況

題　　目	正確答案	接近正確	形容詞描述	知道但忘記	錯誤答案	不知道
現任美國總統	71.07	0.83	4.31	2.99	0.50	19.40
現任南韓總統	37.81	8.13	15.09	3.65	3.48	31.84
現任德國總理	19.24	4.81	10.28	3.81	1.66	60.20
現任行政院長	32.67	8.29	0.33	6.80	6.30	45.61
解釋憲法機關	28.19	N/A	N/A	0.66	26.87	44.28
立委選舉領票張數	18.41	N/A	N/A	0.50	64.51	16.58
不分區政黨票比例	23.55	0.17	N/A	1.99	12.11	62.19
立委數量	8.46	14.76	N/A	1.16	10.45	65.17
立法院第二大黨	64.01	N/A	N/A	1.33	18.57	16.09
軍人犯罪審判機構	24.05	0.66	0.33	0.83	40.13	34.00
核四處理方式	21.72	4.48	6.80	1.49	14.93	50.58
引發學運兩岸協議	48.76	N/A	2.32	4.31	3.65	40.96
基本工資	24.88	13.93	N/A	1.33	28.19	31.67

說　　明：表格內數字為百分比，N/A 表示不適用，或此類無觀察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我們認爲，這樣分段給分的作法可以充分利用從開放式題型所得到的資訊，區分出受訪者是具有完整知識（fully informed），或是僅有部分知識（partially informed）的情況，也不會把具有部分知識的受訪者當作是不具有知識（uninformed），這是採用開放式題型一個很大的優點。在對受訪者所回答的每一題編碼以後，我們先對這些用來測量政治知識的題目進行因素分析，以檢視各個面向的題目是否具有一致性。由於本文是根據文獻及理論的推演，將政治知識區分爲人物、制度以及政策與議題三個面向，因此採用驗證性因素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結果列於表 2。在人物面向上，我們所使用的四個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0.6～0.9 之間，呈現出不錯的結果。其內在一致性統計值（Cronbach's α）達到 0.773，表示用這四道題目來測量人物面向的潛在政治知識，其信度是相當不錯的。

始答案以及編碼對照表可向本文作者索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2　政治知識題目因素分析

面　　向	題　　目	因素負荷量	Cronbach's α
人　　物	現任美國總統	0.651	0.773
	現任南韓總統	0.843	
	現任德國總理	0.789	
	現任行政院長	0.779	
制　　度	解釋憲法機關	0.725	0.661
	立委選舉領票張數	0.457	
	不分區政黨票比例	0.766	
	立委數量	0.578	
	立法院第二大黨	0.646	
政策與議題	軍人犯罪審判機構	0.761	0.637
	核四處理方式	0.718	
	引發學運兩岸協議	0.74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在制度面向上，五個題目的因素負荷量介於 0.4～0.8 之間，以測量潛在的制度面向政治知識來說，這五個題目的效果是可以接受的。這些變項之間的內在一致性統計值爲 0.661，在測量信度上算是還不錯的結果。在政策與議題面向上，除了基本工資這個題目以外，其他題目在測量潛在的政策面向政治知識時，因素負荷量皆介於 0.7～0.8 之間，在測量效果上相當不錯。在整體信度方面，這四個題目的內在一致性爲 0.531；但若是排除基本工資這題，則內在一致性會提升至 0.637。

從因素分析的結果來看，基本工資這道題目和政策面向的其他題目有較大的落差，而且近年來基本工資每年皆調漲，其所測量到的潛在知識和其他題目可能不是在同一個面向上，因此，我們決定將這道題目剔除。在後續要進行的迴歸分析中，政策與議題面向只用軍人犯罪審判機構、核四處理方式、引發學運的兩岸協議這三道題目。[15] 最後，本文在驗證性因素分析的基礎上，採用人物、制度與政策這三個面向的因素分數（factor scores）

[15] 我們也試過將基本工資這道題目納入迴歸分析，得到的結果沒有實質上的差異。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作爲受訪者在這三個面向的政治知識分數。[16]

接下來是本文的控制變數，可能影響個人政治參與高低的因素包括對於選舉關心程度、對於總統（馬英九）表現滿意度、討論政治頻率、政黨認同強度、以及人口統計變項中的性別（男性=1）、年齡（Achen & Wang, 2019）和教育程度。我們預期，選舉關心程度會影響民眾對於投票以及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如果選舉關心程度反映了受訪者的政治興趣，這個變數對於非常態性參與也應該會有影響力（Reichert, 2018）。在總統滿意度方面，這個變數對於投票以及競選相關活動未必會有影響，因爲滿意或是不滿意總統的人都有動機去參與選舉，但是此變數對於非常態性政治參與可能會有重要性，不滿意總統表現的民眾越有可能去參與各種抗議活動，Stockemer (2014) 檢視影響民眾參與非常態抗議行動的因素，也發現對政府的不滿是一項重要因素，因此我們把它列爲控制變數。

討論政治的頻率和政黨認同，在文獻中一向都是會影響政治參與的重要變數。我們預期，當民眾愈常和他人討論政治議題，參與各種政治活動的可能性就愈高。至於政黨認同，在投票與競選相關活動這兩項參與上，有影響力的變數應該是政黨認同強度而不是政黨認同的對象，這是因爲是否參與並未牽涉到候選人或政黨的選擇，且無論是屬於哪一政黨，應該是認同強度越高者，越有可能參與。過去的研究發現，政黨認同程度越強的選民越傾向去投票（黃桃芳，2005；楊孟麗，2003；Conway, 2000: 52-55；Tsai, 2001；Wu & Liu, 2017），因此本文以政黨認同強度作爲投票與競選相關活動的控制變數。在抗議活動的部分，我們以爲反對黨的認同者比較有可能會去參與，由於本研究執行當時的執政黨爲國民黨，因爲我們在依變數爲非常態性參與的統計分析中，將泛綠陣營認同者取代政黨認同強度作爲控制變數。

在人口統計變數方面，教育一直被認爲對於政治參與有很重要的影響（Finkel et al., 2012；Verba et al., 1995；Wolfinger & Rosenstone, 1980）。不過，近年來對於究竟是教育對政治參與直接的影響，還是另有因素有所爭

[16] 受訪者的總體政治知識分數則是將本文所採用的人物、制度與政策等面向的測量題目，全部一起運用因素分析的方式產生一個總體政治知識的因素分數。

臺灣人文社會期刊資料庫

辯，未成定論（Persson, 2015）。在性別方面，女性在投票等低層次的參與並不輸於男性（Kostelka et al., 2018），楊婉瑩（2007）發現在示威遊行、拉票等較高層次的參與，女性往往沒有男性來得積極參與。Gavray 等（2012）發現參與示威抗議的男性高於女性。放入性別變數可以瞭解性別在不同類型參與中是否有差異。另外，過去研究指出年輕人是對於政治參與較爲冷漠的族群，生命週期理論並認爲成年民眾隨著年紀增長，在收入增加、生活趨於穩定之後，參與政治活動的程度會上升；但是在步入老年之後，由於體力、精神的衰退，政治參與會下降，也就是年齡與政治參與會呈現先上升後下降的曲線關係（Wolfinger & Rosenstone, 1980）。Melo 和 Stockemer (2014) 比較德國、法國與英國之政治參與，發現年輕世代較不會去投票，但是在非常態政治參與則正好相反。其次，他們發現年齡與不同形式的參與並非直線的。近年來在臺灣，由於太陽花學運的影響，年輕人對於政治活動的參與似乎有更爲積極的傾向，爲了檢測年齡和政治參與是否仍會呈現如生命週期理論所說的曲線關係，本研究將年齡與年齡的平方項都納入統計模型當中。[17] 各個變數的敘述性統計資料呈現於表 3，若是一個變數爲名目（nominal）或者是等級（ordinal）變數，列出中位數；若是一個變數爲等比（ratio）變數，則列出平均數。

在統計方法上，由於三個依變數皆爲二元變數，因此本研究進行三個洛基迴歸（logit regression）來驗證研究假說。這裡要說明的是，由於政治知識的各個面向彼此之間、以及與總和分數有著很高的相關性（相關係數請見表 4），在探究政治知識的總和與各個面向對於不同類型政治參與的影響時，本不能把各個面向放在同一個統計模型中，理應分開處理，以避免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問題，但是如果爲了避免共線性問題而將各個政治知識面向分開處理，反而會造成忽略重要相關變數（omitted variables）的偏差（King et al., 1994），其所造成的問題比共線性大得多。所以爲了分析的嚴謹性，我們在每個統計分析又分爲五個模型，前四個模型單獨檢測政治知識的總和、人物、制度、政策與議題面向對同一種類型政治參與的

[17] 若年齡的二次項達到顯著水準，且一次項係數爲負值，年齡與政治參與會呈現先升後降的曲線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影響；第五個模型同時納入三個政治知識的面向，以比較其相對影響力。

表 3　各變數的敘述統計

變　數　名　稱	最　小　值	最　大　值	平均 / 中位數
投票參與	0	1	0.74
競選相關活動參與	0	1	0.41
非常態性參與	0	1	0.03
政治知識－總和	-1.34	2.46	0.00
政治知識－人物	-1.37	1.68	0.00
政治知識－制度	-1.04	2.80	0.00
政治知識－政策	-0.98	2.09	0.00
選舉關心程度	1	4	3
總統滿意度	1	4	2
討論政治頻率	1	4	2
性　　別（男性=1）	0	1	0
年　　齡	20	97	52.67
教育程度	1	7	4
政黨認同強度	0	3	2
泛綠陣營認同	0	1	0

說　　明：投票參與、競選相關活動參與、非常態性參與這三個變數的平均數為參與的比例（已剔除遺漏值）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表 4　政治知識各個面向的相關係數

	政治知識－人物	政治知識－制度	政治知識－政策
政治知識－總和	0.89	0.87	0.84
政治知識－人物		0.63	0.64
政治知識－制度			0.63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伍、統計分析結果

表 5 是依變數爲投票參與的統計分析結果，從模型 3、模型 4 可以看出，制度面向以及政策與議題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民眾參與投票都沒有影響。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說預測：人物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投票參與有較大的影響力，然而，模型 2 顯示人物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投票是沒有顯著的影響。既然三個面向都沒有影響，模型 1 當中不論政治知識的總和分數或是模型 5 中的三個面向一起的分析，對於投票自然也沒有顯著影響。

表 5　政治知識與投票參與

變數名稱	模 型 1	模 型 2	模 型 3	模 型 4	模 型 5
政治知識－總和	0.15				
	(0.14)				
政治知識－人物		0.15			0.14
		(0.14)			(0.16)
政治知識－制度			0.14		0.11
			(0.13)		(0.15)
政治知識－政策				0.01	-0.09
				(0.12)	(0.15)
選舉關心程度	0.47***	0.47***	0.47***	0.48***	0.46***
	(0.16)	(0.16)	(0.16)	(0.16)	(0.16)
總統滿意度	-0.37***	-0.38***	-0.37***	-0.38***	-0.37***
	(0.14)	(0.14)	(0.14)	(0.14)	(0.15)
討論政治頻率	0.23	0.23	0.23	0.25	0.23
	(0.17)	(0.17)	(0.17)	(0.17)	(0.17)
男性	0.00	0.04	-0.00	0.10	0.02
	(0.26)	(0.24)	(0.26)	(0.24)	(0.26)
年齡	-0.11**	-0.11**	-0.10**	-0.10**	-0.11**
	(0.05)	(0.05)	(0.05)	(0.05)	(0.05)
年齡平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教育程度	-0.10	-0.09	-0.09	-0.06	-0.09
	(0.10)	(0.10)	(0.10)	(0.10)	(0.10)
政黨認同強度	0.68***	0.68***	0.68***	0.68***	0.69***
	(0.11)	(0.11)	(0.11)	(0.11)	(0.11)
常數	2.14	2.10	1.98	1.58	2.08
	(1.48)	(1.46)	(1.42)	(1.42)	(1.48)
N	501	501	501	501	501
Pseudo R^2	0.181	0.181	0.181	0.179	0.182

說　　明：***p<0.01, **p<0.05, *p<0.1，雙尾檢定，括號內的數值為強韌標準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這個結果和本文的研究假說不符，也和過去學界主流的論點不一致。不過政治知識的三個面向中，還是政治人物的標準化係數最高。

會影響民眾在 2016 總統大選投票與否的因素，主要是政黨認同強度、對選舉的關心程度、總統滿意度。當受訪者的政黨認同強度越高，或是其對於選舉的關心程度越高，去投票的機率就越高，這兩項結果都符合我們的預期。我們沒有預料到的是，對馬英九總統越滿意的民眾，去投票的可能性越低，顯示馬總統的支持者在 2016 總統大選是比較不願意去投票的，這也許是國民黨在選前更換總統候選人所導致。

在人口統計變數方面，性別並未達到顯著水準，就如同過去的發現，兩性在總統大選中之投票率早已沒有差距。教育程度也沒有影響，表示不同教育程度的選民在投票參與上並沒有差異。在年齡方面，雖然年齡的一次項係數爲負值，但是年齡的平方項在所有模型中都達到 0.05 顯著水準，顯示年齡與投票呈現清楚的曲線關係，也就是說年輕人與老年人，在投票上有明顯較高的參與，這顯示年輕人在 2016 總統大選的參與程度很可能是有所提升的。

表 6 是依變數爲競選相關活動參與的統計分析結果，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假說預測：制度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競選相關活動參與有較大的影響力。從模型 3 可以看到，制度面向的政治知識對競選相關活動參與是顯著的；然而，模型 2 中人物面向與模型 4 的政策與議題面向的政治知識對競選相關活動參與都達到顯著水準。也就是說，對競選相關活動參與而言，人物面向、制度面向以及政策與議題面向都具有影響力。由於三個面向都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模型 1 中總和的政治知識也達到顯著水準，模型 5 中三個面向同時分析的結果顯示，制度面向具有統計上的顯著性，但人物與政策面向則否。從這個結果我們可以看到，將政治知識區分爲不同面向，並分別去探討各個面向對於不同政治參與的影響有其必要，若是只看政治知識的總和分數，我們將看不出總和分數的影響其實是來自於某個特定面向。此外，不同的面向會影響同一個參與類型，這顯示政治知識的面向與政治參與的類型不是如 Johann (2012) 所說一對一的關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 6　政治知識與競選相關活動參與

變數名稱	模 型 1	模 型 2	模 型 3	模 型 4	模 型 5
政治知識－總和	0.39***				
	(0.13)				
政治知識－人物		0.25**			0.06
		(0.13)			(0.15)
政治知識－制度			0.38***		0.31**
			(0.12)		(0.14)
政治知識－政策				0.23**	0.08
				(0.12)	(0.14)
選舉關心程度	0.82***	0.82***	0.82***	0.84***	0.82***
	(0.18)	(0.18)	(0.18)	(0.18)	(0.18)
總統滿意度	-0.06	-0.08	-0.05	-0.08	-0.05
	(0.13)	(0.13)	(0.13)	(0.13)	(0.13)
討論政治頻率	0.64***	0.65***	0.64***	0.66***	0.64***
	(0.15)	(0.15)	(0.15)	(0.15)	(0.15)
男性	0.01	0.19	-0.02	0.14	-0.05
	(0.23)	(0.22)	(0.23)	(0.22)	(0.24)
年齡	-0.10*	-0.08*	-0.08*	-0.08*	-0.09*
	(0.05)	(0.05)	(0.05)	(0.05)	(0.05)
年齡平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教育程度	0.00	0.06	0.02	0.06	-0.00
	(0.10)	(0.10)	(0.10)	(0.10)	(0.10)
政黨認同強度	0.10	0.12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0.10)
常數	-1.71	-2.37*	-2.08	-2.40*	-1.76
	(1.33)	(1.32)	(1.28)	(1.29)	(1.33)
N	501	501	501	501	501
Pseudo R^2	0.203	0.196	0.204	0.196	0.205

說　　明：***p<0.01, **p<0.05, *p<0.1，雙尾檢定，括號內的數值為強韌標準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從表 6 中模型 2、3 與 4 的結果來看，人物、制度和政策與議題面向的政治知識都會影響競選相關活動參與。爲了比較這三個面向何者有較大的影響力，我們將三個面向同時進行納入模型分析，結果呈現在模型 5。由模型 5 的結果來看，只有制度面向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其實質影響力是大於政策與議題面向的，這個結果與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假說相符。

在控制變數方面，會影響民眾去參與 2016 年競選相關活動的因素有選舉關心程度以及討論政治頻率。越關心選舉或是越常討論政治的民眾，越有可能參與競選相關活動，這與我們的預期相符。值得注意的是，在投票參與中具有影響力的總統滿意度、政黨認同強度，在競選相關活動參與上

臺灣人文社會學術期刊資訊網

是不顯著的；而在投票不顯著的討論政治頻率，在競選相關活動則是顯著。這個結果顯示：即便投票與競選相關活動同屬常態性政治參與，影響兩者因素並不完全相同；再加上不同面向政治知識的不同效果，本文的發現呼應了先前所提到的「影響不同類型政治參與的因素可能不同」的論點。

在人口統計變數上，一如投票參與，性別與教育程度都不顯著，也就是說，民眾在參與競選相關活動並沒有性別的差異，也不會因爲教育程度的不同而有參與程度的差別。至於年齡，二次項在四個模型中皆達到顯著水準，由於一次項的係數爲負值，所呈現出的是一個比較清楚的先升後降的曲線關係。我們可以說，中年人在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有比年輕人與老年人積極，這個結果與投票參與不大一樣，這可能顯示：雖然年輕人在 2016 年總統大選的參與有提高，但是他們並沒有增加對於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

最後，表 7 是依變數爲非常態性政治參與的統計分析結果，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假說預測：政策與議題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此類參與有較大的影響力。[18] 模型 2 顯示人物面向沒有影響；模型 4 顯示政策與議題面向達到顯著水準；不過，從模型 3 可以看到，制度面向也是有影響力的。這些結果告訴我們，對非常態性政治參與而言，制度面向以及政策與議題面向都具有影響力。由於有兩個面向具有影響力，所以模型 1 中的總和政治知識也達到顯著水準。爲了比較政治知識三個面向對非常態性政治參與的相對影響力，三個面向同時進行分析呈現在模型 5，結果顯示只有制度面向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其他兩者則否。和競選相關活動參與一樣，若我們沒有將政治知識區分爲不同面向，我們將無從得知是哪個部分的政治知識影響了非常態性政治參與。從這些結果我們發現，非常態性政治參與也會受到

[18] 在我們的資料中受訪者曾經有過非常態性政治參與（請願、遊行、罷工等等）的比例約略只有 3% 左右，若進行洛基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時，一般都會出現數值很大的負常數現象，但表 7 的分析結果與這個統計常識相悖，最主要的原因是年齡這一變數具有顯著的負向迴歸係數所致，因爲當回算預測機率時年齡這變數在 log odds ratio 的預測值爲 -11.90，也因爲這變數在 log odds ratio 預測值上的貢獻，使得表 7 模型最後總的 log odds ratio 預測值爲 -7.106，在帶入 linking function 後就會出現在 0 附近的數值。這一個現象同時也出現在表 5 與表 6 的分析中。臺灣大學政治系黃旻華教授幫助我們對這個統計結果提出說明與釋疑，本文在此特別感謝。

臺灣人文社會科學資料庫

表 7　政治知識與非常態性政治參與

變數名稱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政治知識－總和	0.95***				
	(0.36)				
政治知識－人物		0.42			-0.07
		(0.34)			(0.45)
政治知識－制度			1.05**		1.05**
			(0.42)		(0.53)
政治知識－政策				0.42*	0.07
				(0.22)	(0.28)
選舉關心程度	-0.08	0.02	-0.09	0.07	-0.09
	(0.51)	(0.48)	(0.55)	(0.48)	(0.53)
總統滿意度	-0.52	-0.47	-0.53	-0.44	-0.52
	(0.36)	(0.33)	(0.37)	(0.33)	(0.36)
討論政治頻率	1.41**	1.35**	1.49**	1.36**	1.49**
	(0.58)	(0.55)	(0.64)	(0.54)	(0.64)
男性	-0.80	-0.25	-0.96	-0.33	-0.97
	(0.64)	(0.64)	(0.60)	(0.59)	(0.61)
年齡	-0.24**	-0.20**	-0.24**	-0.19*	-0.24**
	(0.10)	(0.10)	(0.10)	(0.10)	(0.10)
年齡平方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教育程度	-0.13	0.04	-0.08	0.02	-0.09
	(0.23)	(0.22)	(0.24)	(0.23)	(0.23)
泛綠認同者	0.18	0.27	0.21	0.24	0.20
	(0.51)	(0.52)	(0.52)	(0.52)	(0.51)
常數	1.44	-0.87	0.90	-0.99	0.91
	(2.94)	(2.79)	(2.94)	(2.93)	(2.74)
N	501	501	501	501	501
Pseudo R^2	0.237	0.205	0.261	0.207	0.261

說　　明：***p<0.01, **p<0.05, *p<0.1，雙尾檢定，括號內的數值為強韌標準誤。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表

兩個政治知識面向的影響，本文預測的政策與議題面向確實是其中之一，但是它的實質影響力並沒有明顯大於制度面向。因此，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假說沒有完全得到支持。

在控制變數方面，討論政治頻率達到顯著水準，表示愈常討論政治的民眾，愈有可能去參與抗議活動，這與我們的預期相符。另外，在這個分析中，我們將政黨認同強度改爲泛綠認同者，這個變數也未達到顯著水準，因此很難說是哪一個陣營的支持者比較可能去抗議。在人口統計變數上，性別與教育程度依然沒有影響力，去參與抗議的民眾沒有性別以及教育程

臺灣大學圖書館

度的差異，此部分與我們的預期不符。至於年齡，其平方項在五個模型中有三個模型呈現顯著。單由模型 5 的結果來看，年齡的一次項係數爲負值，表示年齡與非常態性政治參與有很清楚的曲線關係。這個結果顯示，相較於年輕人與老年人，中年人有明顯較高的機率參與抗議活動，也就是說，在非常態性政治活動這方面，年輕人的參與似乎沒有增加。

陸、結論與反思

民眾對於公共事務的參與是民主政治得以運作的關鍵，而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知識則是政治參與的基礎，因此政治知識的研究成爲政治學者重要的課題。本文想要探究：不同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同一種類型的政治參與是否會產生不同的影響？在各種政治參與類型中，又是哪個面向的影響力比較大？我們的理論預測：在投票參與中，人物面向的政治知識影響較大；在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中，制度面向的政治知識影響較大；而在非常態性政治參與中，政策與議題面向的政治知識影響較大。

本文的實證分析發現：第一，人物面向的政治知識對於投票參與沒有影響力，事實上，三個面向的政治知識都不會對投票參與造成影響，但是人物面向的係數還是較其他兩個面向稍高。第二，人物面向、制度面向和政策與議題面向的政治知識都會影響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其中以制度面向的實質影響力較大。第三，同樣是制度面向以及政策與議題面向的政治知識會影響非常態性政治參與，但就實質影響力來看還是制度面向較大。

本文實證分析結果，無論是競選相關活動的參與或是非常態性政治參與，都以制度面向的政治知識影響力較大，在理論上將政治知識面向拆解成不同的面向來探討與政治參與之間的關聯性是否需要，是值得思索的問題。基本上，本文作者仍傾向於將政治知識區分爲幾個面向。經過了幾十年的爭論，學者對於政治的知識的測量包括多少個面向以及測量的題目依舊沒有共識（Ferrin et al., 2018）。Mondak (2001) 認爲因爲政治的知識的概念在理論上相當複雜且可能包含多重面向，並不是那麼容易操作化。Ferrin 等（2018）發現性別差距會因不同的政治知識類別面向而有差異，性別差距在時事議題差距特別大。黃秀端等（2018）亦同樣發現在人物與制度面

臺灣大學圖書館

向，男性的政治知識高於女性，在地方議題並無性別差距，在與婦女有關的政策議題，則女性的政治知識高於男性。

本研究的結果突顯制度面向政治知識的重要性。相較於其他面向，制度面向不但在競選活動的參與有最強的影響力，在抗議活動的參與中也是如此。在測量上，制度面向會較顯現出其影響力可能跟該個面向的題目比較穩定之故。例如：在制度面向經常被詢問的題目是：「請問在我國，誰或哪個機關負責解釋憲法？」從 2000 年至今大概都維持在 24%～34% 之間。但是對政治人物題目則是波動頗大，林聰吉和王淑華（2007）的研究發現有關「中共國家主席」，在 2000～2004 年之間，從答對 20.3% 至最高的 74.2%，與政治人物更替時間之長短以及與政治人物個人的表現所牽動在媒體的曝光率有關。政策議題更是會隨著議題當時被曝光與討論的程度有關。換言之，隨著議題受關注的程度，民眾答對的比例可能會有所波動，因此要以政治知識面向的類別來解釋其他變數，需要在題目上多下功夫，以提高測量之效度。同時，政策議題非常多，究竟要加入何種政策議題，亦值得思索。黃秀端等（2018）分析之四道女性政策議題中，答對比例由最低的 20.9% 到最高的 67.7%，差異相當大，他們是否爲適當的測量議題，值得更進一步檢視。但是在本文至少發現，若是沒有控制制度面向的政治知識，政策面向的政治知識是有顯著的影響。

三個面向的政治知識與投票參與都沒有顯著關係。我們認爲可能的原因爲：第一，臺灣投票的成本相當低，選前無須註冊、投票所通常離住處不遠、選舉日多在星期六，不用犧牲工作、投票的程序也相當簡便，一般在半小時之內就可以完成。當妨礙民眾去投票的阻力減到最少，民眾自然比較願意去投票，就不需要政治知識做爲心理驅力去克服阻擋投票的障礙。第二個原因是總統選舉對臺灣民主的重要性，自從 1996 年開始，總統直選標示臺灣進行民主化的成就，也成爲臺灣民主的象徵。民主自由突顯兩岸政治制度的不同，在中共的打壓之下，民主自由讓臺灣人民得到尊嚴。因此，在總統選舉中投票可能不是因爲個別選民的知識告訴他應該去投票，而是因爲投票選總統這件事讓臺灣選民覺得光榮又驕傲。

第三個原因是臺灣人民非常關心總統選舉的結果，總統大選決定未來四年的國家領導人以及政策方向，贏者全拿（winner take all）的制度設計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讓獲勝者取得所有的權力與資源，勝負之差猶如天壤之別，因此藍綠雙方都是無所不用其極要贏得勝選，也會積極動員民眾參與。在這樣的氛圍下，臺灣的選舉氣氛都很「熱」，總統選舉之投票率都相當高。[19] 當民眾對選舉的熱情被激起，就比較不需要政治知識驅使民眾去投票。就如同前面有些學者（Calvert, 1985；Lupia, 1992；McKelvey & Ordeshook, 1984）提到在選舉中那些資訊不充分的選民，會學習他們所信任的具有充分資訊的人，政黨若是民眾所信任的，可以提供選民簡單而有效的工具性投票方式。

第四個原因，過去文獻對於解釋投票參與或選舉參與的模型解釋力都很低，俞振華和翁定暐（2017）解釋積極政治參與的有序勝算對數模型，儘管放了很多變數，包括作者強調的公民規範（參與規範認知和義務規範認知），在 2004 的 Pseudo R^2只有 0.0861，2014 之 Pseudo R^2爲 0.0608。在投票參與模型中，2004 的 Pseudo R^2爲 0.1439，2014 之 Pseudo R^2爲 0.1601。而在更早之前，黃秀端（1995）對於選民參與競選活動之分析，即使加入團體意識與動員因素，R^2也才提升至 0.20。本文的政治知識面向，相較於其它變數，其解釋力相對是較高的。當然，有了政治知識之後，並不代表就會行動，究竟中間還需要甚麼樣的中介變數來作爲連結，促使個人參與政治行動，至今並未找到令人滿意之因素。公民規範、政治效能感、政治興趣、團體意識與動員因素雖然在不同的研究中都有顯著，但是對於解釋力的提升仍是有限。

最後，本研究的樣本數原先有 1,200 份，當初有只 600 份爲開放型問卷，另外 600 份爲封閉型問卷，以致能用於本研究分析的只有 600 份，可能會影響統計分析的結果。本文的研究假說並沒有完全得到支持。但總結來說，過去少有研究討論不同面向政治知識與不同政治參與類型之間的關係，本文提出新的論點，將兩者連結起來。實證分析發現，政治知識的面向與政治參與的類型的關係比我們原本所知道的更爲複雜；另外，政治知識不只是總和分數高低的問題，民眾具有的知識屬於哪個面向可能更爲重要，這些發現是本文的貢獻。從本研究出發，未來還可以做更進一步的探討，例如政治參與的類型或許可以再加以細分、政治知識是否還可以有其

[19] 除了 2016 年以外，歷屆總統選舉的投票率都在 74% 以上。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他的面向？兩者之間或許還有未被發掘出來的關係，這些都是可以繼續努力的方向。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林聰吉、王淑華，2007，〈台灣民眾政治知識的變遷與來源〉，《東吳政治學報》，25(3): 93-129。Lin, Tsong-jyi & Shu-hua Wang. 2007. “Taiwan minzhong zhengzhi zhishi de bianqian yu laiyuan” [Changes and Source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in Taiwan]. *Soochow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5(3): 93-129.

林瓊珠，2005，〈台灣民眾的政治知識：1992～2000 年的變動〉，《選舉研究》，12(1): 147-171。Lin, Chiung-chu. 2005. “Taiwan minzhong de zhengzhi zhishi: 1992-2000 nian de biandong” [Political Knowledge among the Electorate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2(1): 147-171.

俞振華、翁定暐，2017，〈影響台灣民眾政治參與的因素〉，《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38: 9-56。Yu, Eric Chen-hua & Ting-wei Wen. 2017. “Yingxiang Taiwan minzhong zhengzhi canyu de yinsu”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From a Viewpoint of Citizenship Norms]. *Survey Research —Method and Application* 38: 9-56.

黃秀端，1995，〈一九九四年省市長選舉選民參與競選活動之分析〉，《選舉研究》，2(1): 51-76。Hawang, Shiow-duan. 1995. “1994 nian sheng shizhang xuanju xuanmin canyu jingxuan huodong zhi fenxi” [An Analysis of Citizen’s Participation in Campaign Activities during the 1994 Gubernatorial and Mayoral Elections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1): 51-76.

黃秀端、林瓊珠、吳俊德、張一彬，2018，〈女性真的知道的比較少嗎？政治知識的再檢視〉，「2018 年台灣政治學會年會暨『變動中的大國關係與民主治理』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11 月 10-11 日），宜蘭：淡江蘭陽校區。Hawang, Shiow-Duan, Chiung-chu Lin, Jun-deh Wu, & Yi-bin Chang. 2018. “Nuxing zhendi zhidao de bijiao shao ma? Zhengzhi zhishi de zai jianshi” [Do Women Really Know less than Men? A Reexaminat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018 Annual Meeting of Taiwanese Political Associ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ajor Power Relations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under Changing World, November 10-11. Yilan: Tamkang University Lanyang Campu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黃秀端、徐永明、林瓊珠，2014，〈政治知識的測量〉，《選舉研究》，21(1): 89-126。Hawang, Shiow-duan, Yuan-ming Hsu, & Chiung-chu Lin. 2014. “Zhengzhi zhishi de celiang” [The Measurement of Political Knowledge].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21(1): 89-126.

黃桃芳，2005，《台灣選民選舉參與之研究：總體與個體之資料的結合》，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碩士學位論文。Huang, Taofang. 2005. *Taiwan xuanmin xuanju canyu zhi yanjiu: Zongti yu geti zhi ziliao de jiehe* [*Taiwan’s Voter Participation in Elections: Combination of Aggregate Data and Individual Data*]. Master Thesis,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楊孟麗，2003，〈投票意願與經濟不景氣：台灣的情形〉，《選舉研究》，10(2): 159-191。Yang, Meng-li. 2003. “Toupiao yiyuan yu jingji bu jingqi: Taiwan de qing xing” [Voter Turnout and Economic Adversity in Taiwa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0(2): 159-191.

楊婉瑩，2007，〈政治參與的性別差異〉，《選舉研究》，14(2): 53-94。Yang, Wang-ying. 2007. “Zhengzhi canyu de xingbie chayi” [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14(2): 53-94.

蕭怡靖，2009，〈選制認知與投票參與：2008 年立法委員選舉的多層分析〉，《政治學報》，47: 29-58。Shiao, Yi-ching. 2009. “Xuanzhi renzhi yu toupiao canyu: 2008 nian lifa weiyuan xuanju de duoceng fenxi” [Perception of Electoral Rules and Voting Participation: A Multilevel Analysis in 2008 Legislative Yuan Electio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7: 29-58.

二、西文部分

Achen, C. H. & T. Y. Wang. 2019. “Declining Voter Turnout in Taiwan: A Generational Effect?” *Electoral Studies* 58: 113-124.

Barabas, J., J. Jerit, W. Pollock, & C. Rainey. 2014. “The Question(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8(4): 840-855.

Barnes, S. H., K. R. Allerbeck, B. G. Farah, F. J. Heunks, R. F. Inglehart, M. K. Jennings, H. D. Klingemann, A. Marsh, & L. Rosenmayr. 1979. *Political Action: Mass Participation in Five Western Democracies*. Beverly Hills, CA: Sage.

Bennett, S. E. 1988. “‘Know-Nothings’ Revisited: The Meaning of Political Ignorance Today.”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69(2): 476-490.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Bourne, P. A. 2010.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a Middle-Income Developing Country.” *Current Research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3): 196-203.

Brady, H. E., S. Verba, & K. L. Schlozman. 1995. “Beyond SES: A Resource Model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9(2): 271-294.

Calvert, R. L. 1985. “Robustnes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Voting Model: Candidate Motivations, Uncertainty, and Converg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9(1): 69-95.

Conway, M. M. 2000.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3rd ed.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Press.

Coy, P. G., L. M. Woehrle, & G. M. Maney. 2008. “A Typology of Oppositional Knowledge: Democracy and the US Peace Movement.”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3(4): 1-15.

Dahl, R. A. 1973. *Polyarchy: Participation and Opposition*.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Delli Carpini, M. X. & S. Keeter. 1991. “Stability and Change in the U.S. Public’s Knowledge of Politic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55(4): 583-612.

Delli Carpini, M. X. & S. Keeter. 1993. “Measuring Political Knowledge: Putting First Things Firs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7(4): 1179-1206.

Delli Carpini, M. X. & S. Keeter. 1996. *What Americans Know about Politics and Why It Matter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DiGrazia, J. 2014. “Individual Protest Particip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Conventional and Unconventional Activism.”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95(1): 111-131.

Downs, A. 1957. *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Ferrin, M., M. Fraile, & G. Garcia-Albacete. 2018. “Is It Simply Gender? Content, Format, and Time in Political Knowledge Measures.” *Politics & Gender* 14(2): 162-185.

Finkel, S. E., J. Horowitz, & R. T. Rojo-Mendoza. 2012. “Civic Education and Democratic Backsliding in the Wake of Kenya’s Post-2007 Election Violence.” *Journal of Politics* 74(1): 52-65.

Galston, W. A. 2001. “Polit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Engagement, and Civic Education.”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4(1): 217-234.

Gavray, C., B. Fournier, & M. Born. 2012. “Non-conventional/illegal Political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articipation of Male and Female Youths." *Human Affairs* 22: 405-418.

Gidengil, E., A. Blais, N. Nevitte, & R. Nadeau. 2004. *Citizens*. Vancouver: UBC Press.

Grönlund, K. & H. Milner. 2006. "The Determinant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candinavian Political Studies* 29(4): 386-406.

Howe, P. 2006.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Electoral Participation in the Netherlands: Comparisons with the Canadian Cas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7(2): 137-166.

Huang, C., H. C. Wang, & C. C. Lin. 2013. "Knowledge of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Voting: Taiwan's 2008 and 2012 Legislative Elections." *Issues & Studies* 49(4): 1-45.

Huntington, S. P. & J. M. Nelson. 1976.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Jennings, M. K. 1996. "Political Knowledge Over Time and Across Generations."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60: 228-252.

Johann, D. 2012. "Specific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Citizens'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Germany." *Acta Politica* 47(1): 42-66.

King, G., R. O. Keohane, & S. Verba. 1994.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ostelka, F., A. Blais, & E. Gidengil. 2018. "Has the Gender Gap in Voter Turnout Really Disappeared?" *West European Politics* 42(3): 437-463.

Larcinese, V. 2007. "Does Political Knowledge Increase Turnout? Evidence from the 1997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Public Choice* 131(3): 387-411.

Lassen, D. D. 2005. "The Effect of Information on Voter Turnout: Evidence from a Natural Experimen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9(1): 103-18.

Lee, F. L. F. 2015. "Internet Alternative Media Use and Oppositional Knowledg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27(3): 318-340.

Lewis, J. 2001. *Constructing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upia, A. & M. D. McCubbins. 1998. *The Democratic Dilemma: Can Citizens Learn What They Need to Kno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Lupia, A. 1992. "Busy Voters, Agenda Control, and the Power of Informa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6(2): 390-403.

Lupia, A. 2016. *Uninformed: Why People Know So Little about Politic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社會科學期刊資料庫

Martinez, M. D. & J. Gill. 2006. “Does Turnout Decline Matter? Electoral Turnout and Partisan Choice in the 1997 Canadian Federal Election.”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9(2): 343-362.

McKelvey, R. D. & P. C. Ordeshook. 1984. “Rational Expectations in Elections: Some Experimental Results Based on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 *Public Choice* 44(1): 61-102.

Melo, D. F. & D. Stockemer. 2014. “Ag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Germany, France and the UK: A Comparative Analysis.” *Comparative European Politics* 12: 33-53.

Milner, H. 2007.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mong Young Canadian and American (IRPP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7-01)*. Montreal: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Public Policy.

Mondak, J. J. 2001. “Developing Valid Knowledge Scal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1): 224-238.

Mondak, J. J. & B. C. Davis. 2001. “Asked and Answered: Knowledge Levels When We Will Not Take “Don’t Know” for an Answer.” *Political Behavior* 23(3): 199-224.

Palfrey, T. R. & K. T. Poole. 198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formation, Ideology, and Voting Behavior.”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1(3): 511-530.

Pattie, C. J. & R. J. Johnston. 2003. “Civic Literacy and and Falling Electoral Turnout: The United Kingdom 1992-1997.”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36(3): 579-599.

Persson, M. 2015. “Review Article: Educ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5(3): 689-703.

Popkin, S. L. 1991. *The Reasoning Voter: Communication and Persuasion in Presidential Campaig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opkin, S. L. & M. A. Dimock. 1999.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Citizen Competence.” In *Citizen Competence and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eds. Stephen L. Elkin & Karol Edward Soltan.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17-146.

Reichert, F. 2016. “How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Translates Political Knowledge Into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vidence From Germany.” *Europe’s Journal of Psychology* 12(2): 221-241.

Reichert, F. 2018. “How Important are Political Interest and Efficacy in the Predication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ongitidual Study Evidence Fr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Germany.” *Internaitonal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33(3): 459-503.

Stockemer, D. 2014. “What Drives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 Two Level Study.” *The Social Science Journal* 51(2): 201-211.

Tsai, C. H. 2001. “Why Do Taiwanese Vote?” *Journal of Electoral Studies* 8(2): 125-158.

Verba, S. & N. H. Nie. 1972.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Verba, S., K. L. Schlozman, & H. E.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attenberg, M. P., I. McAllister, & A. Salvanto. 2000. “How Voting is Like Taking an Sat Test: An Analysis of American Voter Rolloff.” *American Politics Quarterly* 28(2): 234-250.

Wittman, D. A. 1995. *The Myth of Democratic Failure: Why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re Efficien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Wolfinger, R. E. & S. J. Rosenstone. 1980. *Who Vot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Wu, C. L. & T. P. Liu. 2017.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Taiwan.” In *The Taiwan Voter*, eds. Christopher H. Achen & T. Y. Wang.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52-2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問卷題目 — 參與政治活動

非常態性參與	過去三年來，請問您有沒有簽署請願書、遊行示威、靜坐抗議或罷工的經驗（最多可複選四項） ①簽署請願書 ②遊行示威 ③靜坐抗議 ④罷工 ⑤拒答 ⑥看情形 ⑦無意見 ⑧不知道
競選活動參與	在今年的總統和立委選舉中，請問您有沒有觀看候人政見發表會、要求親友投票（或不投票）給某位候選人或個政黨、參加為候選人而舉辦的集會或餐會等活動、擔任候選人或政黨的助選人員或義工、捐錢給候選人或政黨（包括購買餐券、紀念品等）?（最多可複選五項） ①觀看候選人政見發表會 ②要求親友投票（或不投票）給某位候選人或某個政黨 ③參加為候選人而舉辦的集會或餐會等活動 ④擔任候選人或政黨的助選人員或義工 ⑤捐錢給候選人或政黨（包括購買餐券、紀念品等） ⑥都沒有 ⑦拒答 ⑧看情形 ⑨無意見 ⑩不知道
投 票 參 與	請問在這次總統選舉中，您把票投給蔡英文 / 陳建仁、朱立倫 / 王如玄、還是宋楚瑜 / 徐欣瑩？ ①蔡英文 / 陳建仁 ②朱立倫 / 王如玄 ③宋楚瑜 / 徐欣瑩 ④拒答 ⑤看情形 ⑦無意見 ⑧不知道

問卷題目 — 控制變數

選舉關心程度	請問您對這次選舉的競過程關不關心？是非常關心、還算關心、不太關心、還是非常不關心？ ①非常關心 ②還算關心 ③不太關心 ④非常不關心 ⑤拒答 ⑥看情形⑦無意見 ⑧不知道
討論政治頻率	請問您平時會不與人討論有關政治或選舉方面的議題？是時常討論、有時討論、很少討論、還是從來不討論？ ①時常關心 ②有時討論 ③很少討論 ④從來不討論 ⑤拒答 ⑥看情形 ⑦無意見 ⑧不知道
總 統 滿 意 度	請問您對馬英九擔任總統期間的整體表現，您覺得是非常滿意、還算滿意、不太滿意、還是非常不滿意？ ①非常滿意 ②還算滿意 ③不太滿意 ④非常不滿意 ⑤拒答 ⑥看情形 ⑦無意見 ⑧不知道
政 黨 認 同	在國民黨、民進黨、親民黨、台聯跟時代力量這五個政黨中，請問您認為您比較支持哪一個政黨？ ①國民黨 ②民進黨 ③時代力量 ④親民黨 ⑤台聯 ⑥都支持 ⑦都不支持 ⑧拒答 ⑨看情形 ⑩無意見 ⑪不知道
	請問您支持（受訪者回答的黨）的程度是非常支持、還是普普？ ①非常支持 ②普普通通
	您比較偏向國民黨、偏向民進黨，偏向親民黨，偏向台聯，還是偏向時代力量，或是都不偏？ ①偏國民黨 ②偏民進黨 ③偏時代力量 ④偏親民黨 ⑤偏台聯 ⑥都不偏 ⑦拒答 ⑧看情形 ⑨無意見 ⑩不知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

問卷題目 — 政治知識

人物	B1	請問現任的美國總統是誰？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B2	現任的南韓總統是誰？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B3	請問現任的德國總理是誰？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B4	請問我國現任的行政院長是誰？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制度	B5	請問在我國，誰或哪個機關負責解釋憲法？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B6	一般來說，請問在立法委員的選舉中，每一個選民可以領幾張票？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B7	請問政黨至少需要得到百分之多少的政黨票，才能分配不分區立委席次？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B8	請問目前立法院一屆總共應選出幾位立委？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B9	請問目前立法院的第二大黨是哪一個政黨？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政策	B10	請問一般時期軍人犯罪是交由何種法院審判？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B11	請問目前政府處理核四的方式是什麼？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B12	請問前年三月發生太陽花運動抗議事件是針對兩岸之間哪一個協議？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B13	請問目前我國的基本工資為每小時多少元？ _____ ①知道，但忘記 ②拒答 ③不知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and Typ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hiow-duan Hawang,** Jun-deh Wu,****
*Yi-bin Chang,***** & Chiung-chu Lin******

Abstract

Political knowledg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influenc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hen people have higher political knowledge, they are more likely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However, political knowledge has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lso has different types. Does the same dimension of political knowledge have the same influence on different typ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o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same typ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Few scholars have answered these questions so far.

This paper distinguishes between three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people, institutions, and policies and issue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also classifi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voting, election-related activities, and unconventional participation (deliberate petitions, sit-in protests, or demonstrations).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theoretical deductions, this paper develops three hypotheses. First, in voting participation, knowledge of politicians has a higher influence. Second, in the participation of election-related activities, knowledge of institutions has a higher influence. Third, in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nowledge of policies and issues has a higher influence.

---

* DOI:10.6166/TJPS.202006_(84).0001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E-mail: sowd@scu.edu.tw.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Tunghai University.
E-mail: jw0107@gmail.com.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amkang University.
E-mail: cyb@mail.tku.edu.tw.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Soochow University.
E-mail: clinf@scu.edu.tw.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This paper analyzes data collected from a telephone survey conducted after the Taiwanes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 none of the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have influence on voting participation. Second, all three of the dimensions affect the participation of campaign-related activities. Among them, the institution dimension has the greatest influence. Third, the institution dimension and the policy dimension both have influence on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th the former being greater. To sum up, different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do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each type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Keywords: Political Knowledg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Dimensions of Political Knowledge, Unconven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